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主编 郭本禹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美] 卡伦·霍妮 著
Karen Horney

郭本禹 方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心理学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美] 卡伦·霍妮 著
Karen Horney

郭本禹 方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 (美) 霍妮著; 郭本禹, 方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7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ISBN 978-7-300-17774-8

I. ①我… II. ①霍…②郭…③方… III. ①病态人格-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9855 号

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

主编 郭本禹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妮 著

郭本禹 方红 译

Women Shidai de Shenjingzheng Reng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8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译序

感悟大师无穷魅力 品味经典隽永意蕴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①。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

^① 《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

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①。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从本体特征上看，心理学经典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内涵，提出一些心理与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心理学经典是心理学大师与他们所阐释的文本之间互动的产物。其次，从存在形态上看，心理

^① 《辞海（缩印本）》，852页。

学经典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心理学大师的精神个体和学术原创世界的结晶，诉诸心理学大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最后，从价值定位上看，心理学经典一定是某个心理学流派、分支学科或研究取向的象征符号。诸如冯特之于实验心理学，布伦塔诺之于意动心理学，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杜威之于机能主义，华生之于行为主义，苛勒之于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之于人本主义，桑代克之于教育心理学，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心理学，奥尔波特之于人格心理学，吉布森之于生态心理学，等等，他们的经典作品都远远超越了其个人意义，上升成为一个学派、分支或取向，甚至是整个心理科学的共同经典。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①，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

^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

郭本禹

2013年7月3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译者前言

一、霍妮的主要生平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于1885年9月16日出生在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祖先为犹太人，家庭是中上阶层的基督教新教家庭。霍妮的父亲是挪威人，是一位船长，后加入德国籍，再后来担任了北部德国劳埃德船运公司的船队长。霍妮小时候常随父亲远海航行，因此她毕生都爱好旅游，并向往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母亲是荷兰人，与前夫生有四个孩子，同霍妮的父亲结婚后，又生下了霍妮的哥哥和霍妮。父亲笃信宗教，沉默寡言；母亲美丽聪明，热情豪放。在她的回忆中，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因而其童年生活颇不快乐。但她自幼聪颖非凡，学业超群，深受师长和同学的好评。

13岁时，霍妮因自己得病并遇上了一位好心的乡村医生，从此立志要当一名医生。1901年，霍妮经过与父母斗争，进入中学学习——因为在那时女孩很少接受学校教育。毕业后，在母亲的鼓励下，霍妮从1906年起先后进入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医学，191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继续接受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训练。求学期间，她结识了奥斯卡·霍妮（Oskar Horney），两人于1909年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布莉吉特

(Brigitte Horney) 是一名演员，二女儿玛丽安娜 (Marianne Eckardt) 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三女儿瑞娜特 (Renate Patterson) 结婚后随丈夫前往墨西哥居住。在三个女儿当中，霍妮一直与长女关系最为亲密。后来因为霍妮与丈夫性格和兴趣不合，也因为她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精神分析活动之中，她最终与丈夫分手，于 1937 年离婚。

从 1910 年起，霍妮开始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亚伯拉罕 (Karl Abraham) 和萨克斯 (Hanns Sachs) 接受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并参加柏林精神分析协会，1915 年担任该协会秘书。1917 年，霍妮发表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1920 年，她与亚伯拉罕等六人创建了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此从事培训工作。1932 年，她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她以前的一个学生亚历山大 (Franz Alexander) 的邀请赴美担任该所副所长。1943 年，霍妮迁居纽约，在那里创办一家私人诊所，并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同时加盟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1941 年，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霍妮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同年，霍妮以自己为首成立“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并设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作为教学机构，同时创办《美国精神分析杂志》并担任主编。霍妮晚年对佛教禅宗十分感兴趣，与日本道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过交往，她最后的几本著作中都涉及了禅宗思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她曾到日本访问五周，参观了日本东京附近的禅院。1952 年 12 月 4 日，霍妮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 68 岁。

二、霍妮的思想发展

霍妮的精神分析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也就是她在德国和初到美国期间，其研究

主要关注女性心理学问题。她的第一篇讨论女性心理学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发表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一文中对该文作出批评性回应,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弗洛伊德对霍妮观点的重视。在这一期间,霍妮在固守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反对弗洛伊德视女性为有缺陷、永远具有局限性的女性模式,而在她提出的女性模式中,女性具有积极的原始性气质及自我评价。女性嫉妒的并非男性的阳具,而是男性的特权。她们需要更多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霍妮摒弃了从男性视角说明女性、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心理发展的做法。她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的批判,是与对男性主宰的社会与文化之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霍妮的女性心理学观点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决定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在这一阶段,霍妮发表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文,这些论文远远走在其时代的前面,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她去世后由凯尔曼(Harold Kelman)将之汇编成《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 1967)一书以后,女性主义者才重新发现了霍妮,因为她预示了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观点。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后期,也是她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职期间。移居美国以后,霍妮诊治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这有助于开阔其思路。同时,她受到阿德勒(Alfred Adler)等精神分析家和美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影响,其思想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变。她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神经症理论,迅速从正统精神分析走向社会文化学派方向,并成为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并非为性问题,而是为失业、生活失去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霍妮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越来越不适应临床实践,这促使她开始进一步以批

判的眼光考察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彻底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强调以文化和人际关系取向来代替前者的生物决定论取向，主张文化在神经症的冲突与防御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新思想在其《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1937）一书中达到顶峰。随后在另一本著作《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1939）中，她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清算，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新方法。特别是后一本著作，被认为是“在‘新方法’（霍妮）与‘老方法’（弗洛伊德）之间打了14个战斗性电话”。不像其早期女性心理学论文，霍妮的这两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离经叛道为正统精神分析家所不容，整个纽约精神分析学界宣布与她决裂，她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

第三阶段是40年代以后，也是霍妮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后。她在此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出其成熟理论，即神经症人格理论，具体反映在其《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 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 1950）等著作中。^①霍妮认为，神经症源自人际关系的失调，人际关系失调使人失去安全感而产生焦虑，为对抗焦虑，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潜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症需要或者神经症倾向。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症需要。接着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一书中，她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大类型——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每种倾向都代表着对待他人及对待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

^① 在此期间，霍妮还主编了一本专门用于培训的教材《你正在考虑精神分析吗？》（*Are You Considering Psychoanalysis?*, 1946），供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习班所用和向公众普及精神分析知识之用。

和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神经症的人格类型。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一书中，霍妮把人格看成完整的动态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而是人自身，代表他对自己的看法。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自我意象，即人的自我具有潜在、理想化和实在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由此她把自我分为真实自我（real self）、理想自我（idealized self）和现实自我（actual self）三种形式。她的成熟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该书的初版重印了多次，后又以平装本反复再版，最新版重印于2000年，至今销售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该书如同霍妮的其他著作一样，以语言平实、清晰明了著称。她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很少引用诗歌和神话，她在书中大量涉及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得知的东西和常识性的例子。她的著作貌似简单易懂却又含义深刻，她的观察力透彻入微，让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神经症性格段落时感到惊奇，甚至感到局促不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出版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重视。在当时的《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精神分析评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心理学通报》、《社会研究》、《社会动力》等刊物上，发表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学院派心理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①等人撰写的书评。本尼迪克特指出：“霍妮

^① 由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及其弟子尼尔·米勒、约翰·多拉德等人组成的“耶鲁小组”，在1936—1943年组织了一系列讨论班，沙利文和艾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也参加了这一讨论班。他们试图将精神分析的活力、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严谨和文化事实结合在一起，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整合到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中。

博士的方法是非生物学和非本能的。现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并且霍妮博士正在修正经典精神分析对这方面的需要许多修改和业已过时的解释。”^①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并“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②。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指出：“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她接着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时，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

那么，个体的神经症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霍妮认为：“深入探讨有效地导致神经症的各种动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

^① Ruth Benedict (1938), “Review of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i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1), Jan, pp. 133-134.

^② 本“译者前言”中引用未加注释的霍妮的话均出自本书。

种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都是引发神经症过程，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在她看来，儿童本身是无能力的，必须依赖父母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儿童获得父母真正的温暖和爱，就能正常地发展。如果父母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温暖和爱或给予的是虚伪的温暖和爱，就会唤起儿童心中的敌意，她称之为“基本敌意”。基本敌意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儿童的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会压抑儿童的敌意。而对基本敌意的压抑则会导致儿童的焦虑，她称之为“基本焦虑”。儿童一旦产生基本焦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充满危险和敌对，而自己又深感软弱无助。也就是说，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敌意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这种基本焦虑。霍妮指出：“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总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恰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最终导致神经症倾向。

可见，霍妮是从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冲突的视角解释了神经症形成的机理，从而颠覆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起源乃是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观点，以她的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可以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方向。

四、霍妮的思想传播

霍妮既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精神

分析师导师和一位天才的临床实践家，她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她逝世后，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在此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学生们继续传播、研究和发展她的思想，并促进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霍妮的论文和著作手稿、演讲稿、谈话稿以及一些传记作者的采访稿都被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和档案分部。1950年，她生前出版的5部著作被编辑为两卷本《卡伦·霍妮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en Horney*)出版。第1卷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和《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第2卷包括《自我分析》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霍妮的后继者们继续整理出版她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女性心理学》，陆续出版的还有《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Horney Psychoanalysis, 1950—1970, 1972*)、《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The Adolescent Diaries of Karen Horney, 1980*)、《最后演讲》(*Final Lectures, 1987*)、《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The Therapeutic Process: Essays and Lectures, 1999*)和《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The Unknown Karen Horney: Essays on Gender, Culture, and Psychoanalysis, 2000*)。鉴于这些作品国内尚无译本，在此稍作介绍。《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由鲁宾斯(Jack L. Rubins)编辑，除选编了霍妮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的25篇论文，还包括一个内容丰富的卡伦·霍妮长篇自传梗概。《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由其次女玛丽安娜编辑，是从霍妮在1899—1912年所写的日记中选编出来的。这些日记揭示了她毕生与之搏斗的种种困难，以及她最初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最终它们伴随她与亚伯拉罕一起进行精神分析。《最后演讲》由美国精神分析学院前院长英格拉姆(Douglas Ingram)编辑。该书是霍妮于1950—1952年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授的精神分析技术的讲稿。《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